

· 学者专论 ·

[纪念恩格斯诞辰 200 周年]

##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在中国的传播及影响<sup>〔\*〕</sup>

杨须爱

(中央民族大学 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 北京 100081)

**[摘要]**《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是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全面研究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的文献, 是马克思主义走向成熟阶段的作品, 蕴含丰富思想。发表后在世界上广泛传播, 1930 年被首次译为中文全译本出版, 其后又陆续出现 4 个中文全译本, 是在中国传播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之一, 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及话语体系的形成、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蕴含的一些思想、观点和方法对我们今天深入研究中国的发展, 探寻解决当前社会矛盾及其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相关的一些问题, 如经济建设问题、社会阶层问题、“三农问题”、民族问题等仍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中国;中译本;影响

DOI: 10. 3969/j. issn. 1002 - 1698. 2020. 12. 01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产党人要把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悟马克思主义原理当作一种生活习惯、当作一种精神追求,用经典涵养正气、淬炼思想、升华境界、指导实践。”<sup>〔1〕</sup>恩格斯著作《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以下简称《革命》)就是一部值得共产党人常读、从中领悟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经典。因为此著是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全面、系统研究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的文献,是马克思主义走向成熟阶段的作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具有多方面贡献,尤其是丰富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发表后在世界上广泛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正如享誉世界

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所讲,恩格斯的《革命》作为英国在“二战”前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之一,出版后不断被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译成多种语言文字出版,对马克思主义正统思想在国际上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sup>〔2〕</sup>《革命》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 1930 年在上海出版,之后在全国各地又陆续出现 4 个中文全译本,是在中国传播范围最广、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之一。遗憾的是,学界目前尚无对这部不朽文献在中国传播史的专题性研究成果。对这部马克思主义经典的诞生背景、主要思想贡献及在中国翻译、传播的历史和影响作必

作者简介:杨须爱,法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教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基本概念的中国化研究”(19AMZ001)的阶段性成果。

要的考据研究,既有助于人们更为科学、全面地理解和掌握这一经典蕴含的思想,也有助于充实马克思主义中国传播史、发展史的研究。

### 一、《革命》的写作背景与理论贡献

《革命》原为恩格斯给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德国”栏目写的一组评论文章,用英文写成,分19节于1851年10月25日至1852年10月23日间不定期连载,标题为“革命和反革命”,登载时用罗马数字标明篇序。这组文章实际是马克思应《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查理·德纳的约稿而委托恩格斯执笔撰写的。查理·德纳信奉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他在1848年德国革命爆发后到过德国,与马克思会过面,对马克思的卓异才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了解此时的马克思“在德国新闻记者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因考虑到德国革命时期大量移民至美国的德国读者的兴趣,<sup>[3]</sup>于1851年8月邀请马克思担任《纽约每日论坛报》的国外记者,撰写关于德国革命的评论文章。<sup>[4]</sup>马克思当时正忙于经济学研究,难以分身,故致信恩格斯让其代笔。1851年8月,他在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讲,“如果你能用英文写一篇关于德国局势的文章,在星期五早晨(8月15日)以前寄给我,那将是一个良好的开端”;<sup>[5]</sup>之后的几天,在致恩格斯的另一封信中又讲,“至于《纽约论坛报》(实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引者注)的事,我由于搞政治经济学忙得要命,现在需要你的帮助。请你写一些关于1848年以来的德国的文章,要写得俏皮而不拘束。这些先生们在外国栏中是非常大胆的。”<sup>[6]</sup>恩格斯欣然应允。在写作过程中,恩格斯利用了《新莱茵报》合订本中他和马克思在德国1848—1849年革命期间发表的相关文章,和马克思提供给他的一些资料,同时与马克思经常交换写作方面的意见。文章完成后在邮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之前,都先寄给马克思审读。文章发表时仍署名“卡尔·马克思”。直到1913年,他们之间的书信发表后,人们才知道这组文章的执笔人

是恩格斯。恩格斯当时还打算写一篇结束语,即这组文章的第二十节,可惜因故未完成。<sup>[7]</sup>

恩格斯写作这组文章时,欧洲大革命风暴已平息,反动政治势力在欧洲重新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1851年12月初,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推翻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建立专制体制,法国成为欧洲除沙皇制度以外的又一个反动势力堡垒,也成为国际冲突和军事冒险的策源地。1849年上半年,也即德国、匈牙利和意大利的革命运动失败之后不久,还存在着重新爆发革命的可能,但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建立专制政权之后,重新爆发革命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了。在这种情势之下,恩格斯认为首要的任务是深入研究革命形势,总结革命经验,找出革命失败的原因,为从战略、策略上谋划反动年代的欧洲工人运动和未来的革命斗争作必要的理论准备。<sup>[8]</sup>在写作这组文章之前,恩格斯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已经发表了评论1848年德国革命的连载文章《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写于1849年8月至1850年2月间)、《德国农民战争》(写于1850年夏、秋)等。

这组文章在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没有出版过单行本,“只有开头的几篇曾被译成德文在美国的德文报纸《纽约晚报》以及柏林出版的《德意志总汇报》上转载过”。<sup>[9]</sup>1896年,马克思的女儿爱·马克思-艾威林使用原文字(英文)对这组文章进行编辑,于同年4月在英国出版单行本,书名是《革命和反革命或1848年的德国》,成为单行本书籍。在编辑时,她给每篇文章加了标题,写了“编辑说明”作为单行本书籍的引言。这个单行本包括20节内容,也即20篇文章。其中第20篇文章是收录文《科伦的审讯共产党员事件》,其并非《纽约每日论坛报》“德国”栏目登载的标题为“革命和反革命”的连载文。之所以收录此文,是因为爱·马克思-艾威林将其作为为了恩格斯因故未写就的“革命和反革命”的结束语。

《革命》被誉为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一国民主

革命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典范之作，<sup>[10]</sup>丰富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

第一，进一步证明社会经济基础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使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的原理进一步具体化。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科学地分析了德国的社会结构与阶级状况、不同阶级对革命的态度和作用，从而阐明德国革命必然爆发与必然失败的根本原因，证明了“分析社会的经济基础对于了解政治历史和社会思想历史的必要性”，<sup>[11]</sup>以及革命的一个规律：革命反映了人民的迫切需要，但腐朽的社会、政治制度则不让这些需要得到满足。

这一点，以往的研究有所提及，但明确、具体程度似乎不够。<sup>[12]</sup>笔者认为恩格斯分析德国社会阶级状况的重要观点，是有必要提炼和呈现的。

关于德国当时的阶级状况，恩格斯指出，德国的分裂状态使其没有形成像伦敦或巴黎那样的工业中心城市，“作为一切政治组织的基础的人民，其各个阶级的构成比任何别的国家都更为复杂”，<sup>[13]</sup>“国民的大部分既不是贵族，也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城市里的小手工业者小商人阶级和工人，以及农村中的农民”，<sup>[14]</sup>不同阶级的特性及在革命中的作用和态度，使德国革命呈现出分散、复杂、混乱的特点。关于各阶级的特性、在革命中的表现，恩格斯指出，德国资产阶级有鲜明的二重性：一方面他们有发展资本主义的强烈要求，能够和反对封建专制的党派或阶级暂时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推进革命。但另一方面，革命胜利之后，也即他们一旦得到胜利的果实，就会马上反转头对准昨天的革命同盟军，走向反革命。所以，德国资产阶级在革命中不能起领导作用；小资产阶级则永远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摇摆，他们迷信议会制度，不敢依靠人民和武装群众的支持，每当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就表现出政治上的短视、怯懦和动摇，出卖革命；农民阶级分为四部分：富裕农民、小自由农、封建佃农和农业工人，但他们均“没有任何主动性，总是尾随

在参加起义的其他阶级的后面，在工人与小资产阶级之间摇摆”，他们站在革命的哪一边，“几乎总是由他们各自所处的不同的社会地位决定的”；<sup>[15]</sup>工人阶级才是革命的最彻底的真正的战斗力量，是“首先拿起武器与军队作战的主力”，“代表整个民族的真正的和被正确理解的利益”。<sup>[16]</sup>总之，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由于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动摇性，也由于无产阶级的力量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及不成熟性，德国1848—1849年革命失败便成为必然。

第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恩格斯通过深入分析德国的阶级状况与不同阶级对待革命的态度，总结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经验，首先指出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发挥领导作用以及夺取领导权的重要性、必要性，阐明了无产阶级的斗争策略。其次指出农民阶级是一支强大的革命力量，但在革命中“他们永远不能胜利地从事独立的运动”，所以不能做革命的领导阶级，只能做革命的同盟军。<sup>[17]</sup>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才是革命的根本动力。同时充分肯定了革命对社会进步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进一步阐发了马克思关于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的思想，指出“不同阶级的联合，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向来是一切革命的必要条件，却不能持久，一切革命的命运都是如此。……正是旧的复杂的社会机体中阶级对抗的这种迅速而剧烈的发展，使革命成为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推动力；正是新的党派的这种不断的迅速成长，一个接替一个掌握政权，使一个民族在这种剧烈的动荡时期5年就走完在普通环境下100年还走不完的途程”。<sup>[18]</sup>

第三，提出了如何总结一国民主革命运动爆发与失败的根本原因的思想方法。通过对德国民主革命的全面系统研究，恩格斯指出，总结一国民主革命运动爆发与失败的根本原因，“不应该从一些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也不能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人的恶意的煽动，“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动荡的

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sup>[19]</sup>指出“任何地方发生革命动荡,其背后必然有某种社会要求,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sup>[20]</sup>由此他总结,1848年在德国突然爆发的革命运动,“不是个别人活动的结果,而是民族的要求和需要的自发的不可遏止的表现”。<sup>[21]</sup>恩格斯的这一思想方法为后人研究其他国家的革命,和对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提供了范例,被列宁、毛泽东等伟人继承和发展。

第四,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武装起义学说的思想基础。恩格斯在全面介绍德国人民英勇起义时指出,“起义也正如战争或其他各种艺术一样,是一种艺术,它要遵守一定的规则,这些规则如果被忽视,那么忽视它们的政党就会遭到灭亡。”并阐述了革命政党在举行武装起义时必须遵循的一些规则:“第一,不要玩弄起义,除非你有充分的准备应付你所玩弄的把戏的后果”;“第二,起义一旦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采取进攻。防御是任何武装起义的死路,它将使起义在和敌人较量以前就遭到毁灭。必须在敌军还分散的时候,出其不意地袭击他们;每天都必须力求获得新的胜利,即令是不大的胜利;必须保持起义的最初胜利给你造成的精神上的优势;必须把那些总是尾随强者而且总是站在较安全的一边的动摇分子争取过来;必须在敌人还没有能集中自己的力量来攻击你以前就迫使他们退却;用迄今为止人们所知道的最伟大的革命策略家丹东的话来说,就是要:勇敢,勇敢,再勇敢!”<sup>[22]</sup>这段精辟论述,为列宁后来系统阐发马克思主义武装起义学说打下了基础。

第五,阐明社会革命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恩格斯通过回顾数百年间德意志民族和其他民族的关系,对德国各立宪派政府、自由派政府站在反动势力一边镇压波兰人、捷克人的革命运动,到处挑起民族仇恨的行径作了揭示及严厉批判。并揭示了“泛斯拉夫主义”产生的社会条件、本质及其对德国革命的影响。指出德国的

“泛斯拉夫主义”是沙皇俄国在德国波西米亚人、克罗地亚人中虚构所谓斯拉夫民族的幌子,本质上是“反历史的运动,其目的无非是要使文明的西方屈服于野蛮的东方,城市屈服于乡村,商业、工业和文化屈服于斯拉夫农奴的原始农业”。<sup>[23]</sup>通过这些分析,恩格斯阐明社会革命是解决民族问题之关键的思想。

这里有必要指明,以往的研究对《革命》主要思想的归纳基本包含在上述五点当中。但实际上并不全面,至少如下一点也很重要,应是主要思想:对民族主义的双重属性作了清晰辨别,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主义的基本观点。因为恩格斯在《革命》中分析“泛斯拉夫主义”时明确强调,这是一种反历史的民族主义,因而也是反动的民族主义。正是从这里开始,马克思恩格斯对革命的民族运动与反革命的民族运动作了明确区分,<sup>[24]</sup>对民族主义的双重属性作了清晰辨别,<sup>[25]</sup>发展了他们之前关于民族主义的一些观点。

## 二、《革命》在中国的翻译、传播

《革命》发表后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关于它的价值和影响,列宁的评价最有代表性。列宁1914年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明确讲,马克思1851年8月至1862年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大量文章中,<sup>[26]</sup>“革命和反革命”是特别出色的一组文章。<sup>[27]</sup>不但如此,列宁还在自己的理论研究中多次援引、评价《革命》中的相关论点,并对相关思想加以发展。如在《马克思主义和起义》《局外人的意见》等文中,列宁不但援引《革命》关于武装起义的论述,同时还强调,马克思把“武装起义是受特殊规律支配的一种特殊的政治斗争形式”的“真理说得非常清楚”。<sup>[28]</sup>对这部文献中阐明的德国资产阶级在革命中不能起领导作用的思想,以及关于革命斗争策略的总结,列宁同样十分重视,并加以继承和发展。列宁在分析俄国1905—1907年革命问题(比如性质、动力等),阐发他之前提出的俄国无产阶级在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必须掌握领导权的思想时,多次论及恩格斯在《革命》中阐明的思想等。实际上,除了列宁和前文提及的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之外,后世还有许多学者也高度评价了恩格斯《革命》的理论贡献及影响。例如,前联邦德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海因里希·格姆科夫讲,《革命》是“恩格斯直接总结1848—1849年革命经验的最后一部理论作品”,列宁在日后发展自己的革命理论时,全面吸取了恩格斯这部著作的基本思想。<sup>[29]</sup>再如,此书第一个中文全译本译者刘镜园也认为,恩格斯的《革命》“是一部用辩证的唯物论解释历史的杰作”。<sup>[30]</sup>正是因为此著的思想价值,其自20世纪30年代起被不断译为中文,在中国广泛传播。

据笔者考证,从《革命》的首个中文全译本1930年5月在上海出版算起,其在中国传播的90年间,共出现五个完整的中文全译本。<sup>[31]</sup>

第一,刘镜园译本。1930年5月30日,刘镜园翻译的恩格斯《革命》在(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书名译为《革命与反革命又名(一八四八年的德国)》,成为第一个中文全译本。从“译者序言”可知,这个译本是根据卡·考茨基1896年翻译出版的德文本和当时在苏联出版的俄文单行本翻译的。这个译本的封面上印有英文书名*Revolution and Counter - Revolution or (Germany in 1848)*的字样,32开平装,竖排,使用简化汉字,包含20节内容,正文前有“译者序言”“编辑者言”(爱·马克思-艾威林编辑此书第一个单行本时写的说明)。但卡·考茨基写的德文版序言“因为对于中国读者没有大的兴趣,故未译出”。<sup>[32]</sup>这个译本在新生命书局先后三次再版,但版式、字体、内容等均与1930年的版本完全相同,其中第三次再版时间为1936年5月10日。从版权信息来看,此书三次再版的印刷数量共5000册。<sup>[33]</sup>

第二,王右铭、柯柏年译本。1939年3月,王右铭、柯柏年合作翻译的恩格斯《革命》在(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书名译为《德国的革命与反

革命》,成为第二个中译本。这里需要说明,这是中国共产党直接组织翻译及出版的第一个《革命》中文全译本。译者王右铭早年留学法、英两国,回国后起初在北京大学任教,秘密从事革命活动,抗战爆发后奔赴延安,当时在中央党校、陕北公学担任政治经济学教员,是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代表人物之一;柯柏年早年先后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上海大学,读大学期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爆发后回到家乡广东参加国民革命,曾在周恩来领导的国民革命军东征军总政治部工作,担任过社会科副科长、澄海县政治特派员等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流居海外避难一段时间,之后辗转到达上海,担任过江苏省委上海闸北区第三街道党支部书记,全面抗战爆发后奔赴延安,起初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所工作,之后调入中央马列学院编译部,在到达延安之前已翻译多部马克思主义著作。他们二人都是当时在延安为数不多的能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难得人才,他们合作翻译《革命》一书,源自1938年5月在延安成立的中央马列学院编译部执行中央关于重点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著作的指示。由于刚成立的马列学院编译部工作人员不足,所以参加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的人员除了本部门人员之外,还包括当时在党内担任领导职务的一些同志,以及来自国统区的一些教授、学者。这是他们二人合作翻译恩格斯《革命》一书的直接原因。

当时中央组织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一部分是首次翻译,一部分是出于提高译文质量的重译或校译,《革命》属于后一种情况。从这个译本的行文推断,其很有可能根据爱·马克思-艾威林编辑的英文版本翻译,同时参考了刘镜园译本。这个译本相比刘镜园译本发生的重要变化主要有:一是排版格式变为横排;二是除了正文20节内容之外,还附录另外三篇恩格斯的文章。<sup>[34]</sup>1939年4月,这个译本在(延安)解放社重印,译文、版式等均未变动,但译者改为王石巍、柯柏年。1949年,该译本先后在(北平)解放

社、(上海)解放社、(天津)解放社、山东新华书店、东北新华书店等机构多次重印,但译者因历史原因再次改为“柯柏年等译”。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出版社又多次再版该译本,译者署名均为“柯柏年等译”。

第三,中央编译局1961年译本。1961年10月,中央编译局编译的中文第1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在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收录《革命》全文,成为其第三个中文全译本。这个译本是在王右铭、柯柏年译本的基础上,根据俄文第2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恩格斯的原著文字校译而成。相比王右铭、柯柏年译本,这个译本的变化主要有:首次将书名译为《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正文只包含《纽约每日论坛报》“德国”栏目登载的题目为“革命和反革命”的19篇连载文章;大多数篇章标题有了新的译名。这个译本其后于1962年2月在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采用大32开,横排平装,共计273(2+271)页,正文部分和附录文章中的第一篇,根据中文第1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译文排印,附录文章中的第二篇、第三篇根据1958年1月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的译文排印,书后附注释42条。1972年5月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文第1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中收录的《革命》,采用的也是这个译本。

第四,中央编译局1995年译本。1995年6月,中文第2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在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第一卷全文收录《革命》,成为其第四个中文全译本。这个译本是在第三个中文全译本的基础上,根据历史考证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部分第11卷校译而成。译文仍然包括十九节内容。这个译本同时编入中文第2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一卷),1995年6月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与第三个中文全译本相比,这个译本中一些术语的译法、注释等发生变化。例如,第九节的译名,由“泛斯拉夫主义。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战争”变为“泛斯拉夫主义。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战争”;第十八节的译名,由“小资产阶级”改为“小生意人”;文后注释由42条增加到57条。

第五,中央编译局2009年译本。2004年,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后,中央编译局根据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正在编撰的MEGA2中收录的原文字版本、第一个英文单行本,对《革命》的译文和资料再次审核和修订,编入2009年12月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十卷本,第二卷),成为第五个中文全译本。这个译本仍然有十九节内容。相比较第四个中文全译本,这个译本对一些术语作了校译,同时合并了一些注释。例如,对十八节的译名,第四个中文全译本译为“小生意人”,这个译本则又校订为第三个中文全译本采用过的“小资产阶级”。文后注释调减为54条(第四个中文全译本的文后注释为57条)。该译本其后被全文收录在2012年9月出版的中文第3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2016年12月又在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单行本全书共155(2+5+148)页,目录前有“编辑说明”,目录与正文之间有“编者引言”,正文后有注释、人名索引,正文中还有插图2幅、译者编写的页下注释若干条。

除上述5个中文全译本之外,《革命》还有一些中文节译本、外文本出版。笔者目前发现的有三例:1944年,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出版的中文版《马恩列斯论游击斗争》一书,节译了《革命》第17节“起义”;1961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根据俄文版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选》(第一卷),也节译了《革命》第17节“起义”;1977年,(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英文版本。

此外,一些党校、干部学院、科研院所及普通高校编写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专题文选,不少都根据不同中文全译本节选了《革命》中的有关篇章。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理论室选编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问题文选(马克思恩格斯卷)》就节选了此著第

一、四、五、七、八、九、十四等节的内容。<sup>[35]</sup>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版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题中之义,也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性工作。从前文可见,《革命》自1930年被首次译为中文并出版以来的90年间,在中国先后出现5个中文全译本,数十次被翻印,在全国各地发行销售。延安时期,《革命》就被列为在中国重点传播的马克思主义书籍,王右铭、柯柏年译本因此被多次再版或重印,在各解放区和国统区广泛传播。新中国成立后,随着《革命》新的中文全译本不断出现,其在中国传播的范围更加广泛。

### 三、《革命》在中国的历史影响与当代启示

一百多年来,为振兴中华民族、推进中国思想文化的现代化发展,“无数志士仁人历经千辛万苦把马克思主义真经取回来,并通过翻译研究形成了汗牛充栋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由此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化的典藏基础,为实现中华文化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化作出了巨大贡献”,<sup>[36]</sup>《革命》就是这些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的代表之一。其在我国的广泛传播,对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第一,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走向成熟产生一定推动作用。毛泽东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和研究是众所周知的,尤其在延安时期。1938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马列学院,下设两个部门,其中一个为编译部,主要负责编译马列主义著作,这也是中共党史上第一个专门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机构。编译部开始运行后最先编译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出版时称为“马克思恩格斯丛书”。最初编译的书目由毛泽东亲自审定,选取的都是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的“经典”,其中便有《革命》,可见毛泽东对此书的重视。由此可以肯定,毛泽东最晚于此时读到了《革命》。这些书目绝大部分都已经

有了一个或多个中译本,这次编译属于重译,目的是提高译文质量,能更准确地反映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同一批重译的其他著作还有《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马恩通信选集》等。<sup>[37]</sup>

由中央马列学院组织,王右铭和柯柏年合作重译的《革命》,也即《革命》的第二个中文全译本,于1939年3月在上海生活书店出版,同年4月在(延安)解放社作为“马克思恩格斯丛书”之第八种重印,而标志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走向成熟的理论文章《〈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也于之后的1939年底至1940年初陆续发表。细加分析不难发现,毛泽东在这些文章中对中国各阶级的发展状况、特性、对待革命的态度及与中国革命关系的分析,相比之前更为全面、精准,而这些分析方法和背后的思想,甚至一些具体的观点,与《革命》中的一些思想、观点有着很高的一致性,可以说是对《革命》思想的运用和发展。例如,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分析中国各阶级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时强调,“中国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具有“二重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政治上的软弱性,革命环境一变化“它就会动摇变节”;“无产阶级的坚固的同盟者是农民”等。<sup>[38]</sup>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与中国革命的动力等问题时指出,由于“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领导,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民族资产阶级是带两重性的阶级”;“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他们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在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中,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坚固的同盟军”;“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等。<sup>[39]</sup>在《新民主主义论》中

批驳资产阶级专政时强调,“中国资产阶级,以大资产阶级为首,在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刚刚由于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力量而得到胜利之际,他们就一脚踢开了这些人民大众,独占革命的果实,而和帝国主义及封建势力结成了反革命联盟”等。<sup>[40]</sup>这些论述,在恩格斯《革命》中都能找到思想、观点的原型。当然,这不是说毛泽东的上述思想、观点完全是受《革命》影响的结果。因为《革命》关于社会各阶级与革命关系的分析及思想,在比《革命》早三年发表,且在中共建党前就已传入中国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共产党宣言》中就有相对集中的体现,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关于这方面,《革命》中的分析、论述要比《共产党宣言》具体、丰富得多。而且,毛泽东的论述、观点与《革命》更为接近、一致。由此可见,毛泽东发表上述理论文章时很有可能直接受到了《革命》的影响或启示。而受到影响的也不仅仅是毛泽东本人,还有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创立作出贡献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

第二,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发展的影响。不同时期的翻译者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基本术语的翻译用词的变化表明,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基本观点的理解是不断变化,逐步深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形成,最基础的环节是首先用中国语言准确地表述马克思经典著作中的基本术语、基本观点、基本思想,然后在人民大众中广泛传播,被普遍地、系统地接受和运用,最终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对中国人而言全新的,也即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解释社会与世界,以及用于指导人们改造社会的知识体系、表述体系。《革命》最初被译为中文及出版发行的年代,正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快速发展并首次形成高峰的时期。尤其是前文述及的刘镜园译本(1930年)和王右铭、柯柏年译本(1939年)中的许多术语,不但与同时期的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译词一致,也与该书的最新权威中译本(中央编译局2009年译本)一

致。比如,反映社会构成单位、群体的术语:“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资本家”“封建贵族”“封建领主”“农民”“工人”“人民”“委员会”等;反映社会发展阶段、政治制度及组织的术语:“现代”“封建制度”“中央集权”“宪法”“政党”“共产党”“国家”“帝国”“独立国家”“议会”“国民议会”“邦”“军队”等;反映社会运动、思想的术语:“革命”“反革命”“革命运动”“斗争”“政治运动”“战争”“统治”“政治”“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哲学”“权力”“利益”“政策”“舆论”“出版自由”等;反映人名、国名、地名、事件的术语:“马克思”“傅立叶”“圣西门”“路易十六”“德国”“法国”“英国”“俄国”“波兰”“欧洲”“普鲁士”“维也纳”“奥地利”“柏林”“法国大革命”等。这些术语,许多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范畴。这表明《革命》从1930年起就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的重要载体,至今如此。

《革命》虽然完成、发表于一百多年前,但其蕴含的一些思想、观点和方法具有非凡的历史穿透力,对我们今天深入研究中国的发展,探寻解决社会矛盾及其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仍有重要启示价值。

第一,目前仍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中心工作、决定性因素。在这方面,我国走过弯路,遭受过严重挫折,应该说教训十分深刻。恩格斯强调,经济基础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具有决定性影响。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观点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发展水平、现代化程度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历史性变化,堪称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但我国目前仍然面临着内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社会矛盾,外部面临着逆全球化、颜色革命、霸权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国际挑战。要成功解决国内矛盾,化解国际风险,我们就要坚定不移地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会主义思想为根本指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把发展国内经济作为解决这些问题最基础、最根本的途径。

第二,要深化认识我国当前的社会分层问题,各阶层的现状、特点以及他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作用,更有效地动员、组织各阶层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恩格斯一百多年前对德国社会各阶级及其对德国革命态度、作用的分析启示我们:一国之内不同的阶级、阶层对社会革命总会持不同态度,要使他们共同致力于一个旨在实现民族解放、独立,进而实现民族复兴,以及最终实现人类解放的崇高政治目标,就必须坚持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必须坚持对各阶级、阶层的力量不断整合。新中国成立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我国的剥削阶级整体上已经被消灭,但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农民阶级仍然存在,这两个阶级又整体分化为多个社会阶层,具体包括普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公务人员、国有企业管理者、非公企业主、个体户等。这些阶层构成当今中国的各族人民。我们要认识到,当今“中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主要的就是这七大阶层的团结;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主要的就是这七大阶层团结的力量”。<sup>[41]</sup>因此,我们要注重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和社会等层面不断整合各个社会阶层,尤其是要防止阶层固化,处理好不同社会阶层创造财富与分配财富、社会资源的关系,不断寻找、扩大各个阶层的最大公约数,使全体中国人民同心戮力于国家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第三,要坚持不懈地解决好“三农问题”,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同时加强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和组织。当前,我国乡村人口仍有5.6亿,<sup>[42]</sup>数量十分庞大。尽管乡村人口也在不断实现着代际更替,而且也已分化为不同的群体,但总体上在中国各阶层中仍是受教育水平、组织化程度及思想觉悟程度最低的群体,也是我国最大的弱势群体。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而

言,这个群体既是生力军之一,也是更需要分享社会发展成果、最需要进一步动员和组织起来的群体。数量众多的人口并不必然产生强大力量,除非他们被有效地组织起来了。恩格斯关于德国农民对待革命的态度、他们的组织化程度以及在革命事业中作用的分析启示我们:要让乡村人口、农民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既能发挥应有作用,也能享受到更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成果,就必须继续坚持将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也要把加强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加强乡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其他社会组织建设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的顶层设计和实施规划中,以此来推进提高农民思想政治觉悟和组织化程度的工作。

第四,要坚持从国家安全与发展全局的高度来认识、解决我国当前的民族问题。恩格斯强调,社会革命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民族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之一,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民族作为一种历史性的现象,在社会主义时期,仍将长期存在,民族问题也会长期存在。我国今天的民族问题总体上包含两类:一类主要与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发展问题相关,另一类主要与个别少数民族中极少数成员的政治认同、立场相关。前者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后者属于敌我矛盾。但无论哪一类都事关我国的民族团结、政治稳定、社会和谐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思想方法认识这些问题,分析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全局、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高度来探寻这些问题的治本之策。治理这些问题时首先要分清矛盾的性质,在运用物质力量、经济手段和精神力量、文化与意识形态手段时注意区分好主次关系。

第五,要时刻警惕国外反华势力在我国边疆地区煽动民族主义,危害我国民族团结大好局面、边疆安全和政治稳定的图谋。恩格斯指出,挑起他国民族之间的仇恨,煽动一国内部的民族

主义,是资产阶级政府为实现自身利益而惯用的手段。诚如恩格斯所言,19世纪末期以来,中国遭遇的边疆危机、民族分裂主义问题,始终都有国外列强、敌对势力的身影,可以说绝大多数都是各种国外敌对势力一手制造的。“藏独”“东突”“蒙独”等分裂势力目前之所以仍然难以根除,国外反华势力或明或暗的鼓动、扶持是最根本的原因。对此,我们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认识。同时,我国少数民族中有30余个是跨界民族,我们也需要高度警惕各种敌对势力,尤其是国外反华势力在这些民族当中渗透,煽动地方民族主义、泛民族主义,坚决维护、巩固中华各民族大团结的良好局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保障边疆政治稳定和国家战略安全。

### 注释:

- [1]习近平:《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75页。
- [2][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如何改变世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奇》,吕增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第194、195页。
- [3][苏]李阿萨诺夫:《马克思恩格斯合传》,李一氓译,上海:江南书店,1929年,第124页。
- [4][英]戴维·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传》(第4版),王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74页。
- [5][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16、332页。
- [7][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07页。
-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前言”第1页。
- [10][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八卷说明”第x页。
- [12]如张泽森:《读〈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教学与研究》1964年第1期;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编者引言”第1-3页。
- [13][14][15][16][17][18][19][20][21][22][23]恩

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5、8、106、105、106、10、11、36、4、4、4、4、102、103、54页。

[24]杨须爱:《马克思主义民族殖民地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民族研究》2014年第2期。

[25]王希恩:《批判、借助和吸纳——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主义论述的再认识》,《民族研究》2007年第5期。

[26]列宁在写作《卡尔·马克思》一文时尚不知道《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的真正作者是恩格斯。

[27]《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85页。

[28]《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73、374页。

[29][德]海因里希·格姆科夫等:《恩格斯传》,易廷镇、侯焕良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5年,第219、220页。

[30][32]恩格斯:《革命与反革命 又名(一八四八年的德国)》,刘镜国译,上海:新生命书局,1930年,“译者序言”第1、16页。

[31]此处指汉语译本,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彝文、壮文等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译本没有统计在内。

[33]参见恩格斯:《革命与反革命 又名(一八四八年的德国)》,刘镜国译,上海:新生命书局,1930年,“版权页”。

[34]附录的三篇文章译名分别为:(一)《中央委员会致共产主义者联盟的信》;(二)《共产主义同盟史》;(三)《马克思与〈新莱茵报〉》。

[35]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理论室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问题文选(马克思恩格斯卷)》(上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278-294页。

[36]杨金海:《“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总序》,方红:《〈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本考》,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3页。

[37]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陕西省志·出版志》,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214、215页。

[38][39][40]《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06-608、625、639、645、623页。

[41]苏伟:《当前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7期。

[42]该数据为我国2018年末的乡村人口总数。参见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19》,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9/indexch.htm。

[责任编辑:刘 鏊]